

文學翻譯評價中的語用視角介入

——以小說《愛瑪》的中譯本比較研究為例

毛延生*

摘要：如何全面而又合理地評價文學作品的翻譯效果一直是一個至關重要但又非常棘手的話題。本文認為，語用視角介入可以為這一難題的攻關提供一定的啟示，具體表現為言語行為、會話含意和面子策略等維度的考察。換言之，文學作品翻譯的評價應該充分考慮語用視角介入的可行性與指導性，這是決定選取何種翻譯策略的主要參照標準，也是避除原文和譯文之間語用差異評價有失偏頗的有效方法之一。

關鍵詞：文學翻譯 評價 語用視角 介入 《愛瑪》

一、引言

語用翻譯可以被看作“從語用學的角度探討翻譯實踐問題，即運用語用學理論去解決翻譯操作中涉及到的理解問題和重構問題、語用和文化因素在譯文中的處理方法，以及原作的語用意義（pragmatic force）傳達及其在譯作中的得失等問題”（張新紅、何自然，2001：290）。語用翻譯源流在國外可以回溯到Gutt（1991）的著作*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他嘗試以關聯理論為視角探究翻譯問題。此外，Hickey（2001）編輯的論文集*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收錄了13篇論文，分別就語用學如何為翻譯過程與結果評價提供一定參考做出了有益的探討。誠如Hickey所言，“語用視角介入下的翻譯研究可以更為有效地完成翻譯的對等解析與建構，這就能夠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解釋翻譯中存在的諸多理論及方法論方面的種種難題。”（葉苗，1998：10）目前，內地已有不少學者關注如何從語用視角切入文學作品的翻譯研究，但借助語用視角切入文學作品譯本的比較研究還比較少見。有鑒於此，本文以小說《愛瑪》的兩個中譯本為具體研究對象，借助語用學相關知識（言語行為理論、會話含意，以及面子策略）嘗試展開小說中譯本的比較研究，力求說明語用學理論如何應用於文學翻譯的具體路向把握，以及原文話語效果再現。這樣做意義有二：從翻譯的本體角度來講，可以更好地把握文學作品的翻譯的等效性，從而避免誤譯與硬譯所造成的“似是而非”對等性；從語用學本體來說，通過文學作品翻譯的語用考慮，還可以驗證語用學理論對於文學語言闡釋的普適性外延。

* 毛延生，文學博士，黑龍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哈爾濱工程大學外語系副教授。本文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項目（編號：HEUCF101201）子課題“文學語用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並得到2010年度中國博士後科學研究項目（編號：20100481032）及黑龍江省博士後科學研究資金的資助。

二、語料說明

選擇《愛瑪》作為分析的範本，是因為在簡·奧斯丁的小說中，《愛瑪》是藝術上最為成熟的一部，它結構精巧，妙趣橫生，喜劇氣氛籠罩全書，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左自鳴，1995：29）。從小說人物社會關係的豐富程度來看，《愛瑪》同樣滿足了描述的充分性，所涉及的相對或絕對社會權勢較多，並且作者的寫作風格總是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弦外之音”，語言生動，對話鮮活。限於篇幅和精力，本文選擇了小說《愛瑪》第三部分第七章作為分析的樣本語料，具體原因如下：其一，這一章節富含動態的對話交際，在本章幾乎小說中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有話說；其二，情節起伏變化，社會權勢關係豐富多樣，其中涉及父子干係、夫妻關係、朋友關係、情人關係等。上述兩點滿足了本研究展開語用分析的描述充分性前提。此外，外國已有學者（Moroni，2007）就這一章節進行了語用分析，因此語料分析的有效性上具有較好的前期經驗，這可以有效避免文本解讀偏誤所附帶的過度解讀性錯誤出現於本文當中。顯然，這使得本研究對於所選語料的分析主觀性可以控制到最佳，距離翻譯研究的科學性也就更近。就小說的情節而言，這一章主要交代了到Box Hill遊山的經歷，其中Emma（Woodhouse小姐）、Frank Churchill、Knightley先生；Jane Fairfax；Elton夫婦；Bates小姐；Weston先生幾個人積極投入到談話當中，而Harriet Smith是唯一的一個從頭到尾保持沉默的人。在本章，幾個人物之間存在隱性的矛盾衝突（Eltons夫婦與Emma之間；Jane Fairfax與Emma之間；Knightley先生與Frank Churchill之間）。由於上述存在的隱含的矛盾衝突，加之未曾公佈的婚訊關係，小說人物的話語分別帶有話語暗含特點。

從語用學的角度充分考慮小說《愛瑪》的語用元素保留程度，最佳的分析對象就是人物之間的對話。從小說本身來說，小說中的對話不只是簡單的內容表徵標記，同時還揭示了人物的自我形象塑造、社會地位，以及彼此之間的全息關係；從語用範式來說，對話的分析是其關注的根本，具體處理方法也最為駕輕就熟。自然而言，小說中的對話就是考察譯本處理言語行為、話語含意，以及會話策略的必然載體，這些手段特別是在傳達“消極”消息時格外顯得引人注意。有關文學語篇對話的真實性，這裡需做如下說明：本文承認文學對話和現實對話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Leech、Short，1981：159-160），例如並不存在回答的打斷、重迭、修正、重述以及延遲（Levinson，1983：326）。但是，文學作品中的對話以有效地影響讀者為皈依，也就是說它們必須盡力仿擬現實話語從而觸動讀者的心靈。換言之，本文承認文學作品中的對話具有一定的提純性嫌疑，但這一提純屬性並未使得這些對話完全背離現實對話。文學作品中對話的這種理想化傾向同語用學分析視角具有本體同一性，因為語用學同樣具有類似的理想化提純特徵——語用學研究的語言使用者是“模範交際者（model person）”，他們以理性為指導完成話語交際（Brown、Levinson，1987：58）。概而言之，以文學語料為語用分析對象具有充分的本體與實踐可能性與可行性。

三、語用視角介入範疇舉隅

從語用視角介入文學翻譯評價，主要表現在三個維度上譯者在譯文中所作的等效處理，分別是言語行為、會話含意和面子策略。¹在以下的分析當中，對於原文的語用解讀標記為原文闡釋，而對譯文的語用評估則另行標記為譯文評析。本文選擇將原文和譯文的分析分開處理，是因為這樣會更好地表明語用視角如何介入於具體的文學譯本比較當中去。就現有文獻，選取了小說《愛瑪》的兩個中譯本：一個是李文俊、蔡慧（2008）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另一個是祝慶英、祝文光（2007）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出於分析與論述的經濟性考慮，前者標記為李（2008），後者標記為祝（2007）。下面分別就言語行為的多位剖析、會話含意理性提取和面子策略的靈活再現等三個範疇，評析文學翻譯評價中語用視角介入的具體實例。

（一）言語行為的多維剖析

Austin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言語行為包括以下三種具有“特徵性意義”的語言行為：以言指事行為（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行為（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成事行為（perlocutionary act）。其中，以言行事行為指說話人旨在通過話語實施某個交際目的或者執行某個特定功能的行為。從功能上講，以言行事行為往往可以表達或述說某種決定、願望、預見等語用用意（pragmatic force）²，這也正是其特徵性意義之所在。從本質上講，使話語具有交際能力的言語行為是“施為用意”。原文中具有這一語用內涵的“施為用意”表徵話語在譯文中必須得以重現，否則會導致語用誤讀，例如：

例一：

原文闡釋：對於Frank的搭訕，Emma雖然予以理會，但還是批評他脾氣不好（you were very cross），並說明對此莫名其妙（I do not know what about）。對此，Frank回答說“Do not say I was cross. I was fatigued. The heat overcame me.”。在當下語境，Frank的話語表達最為關心的不是通過辯解來證明Emma是錯的。否則，二人可能會因為彼此的爭執而發生矛盾，這與Frank在此情此情下與Emma搭訕這一交際意圖截然相反，因此不具現實可能性。相反，Frank只不是在找一個理由搪塞過去，從而進一步和Emma攀談。據此來看，Frank的這一系列話語的“施為用意”並不在於辯解，而在於打開話題。這一點也和此時小說試圖刻畫Frank死求白賴的形象休戚相關。如果這樣的話，譯文就要通過相應的手段再現這樣的“施為用意”，而不能按照字面意思予以僵硬地處理。

譯文評析：李（2008）通過引入表現“施為用意”的語氣詞（illocutionary particles）成功地傳遞了Frank原話的“施為用意”。具體來說，他們將Frank的話語譯為“哪是我脾氣燥啊。我是累的。天那麼熱，我撐不住啦。”通過這幾個能讓讀者感受到情緒、語調的語氣詞，李（2008）一方面緩和了Frank話語裡命令式（Do not say I was cross）及其直接否定可能引起的直接面子衝突，顯然這是急於打開話題的Frank最不願意看到的；另一方面通過補充“施為用意”的語氣詞，李（2008）也十分成功地傳

遞了Frank自我辯解的意味，並生動地塑造了此情此景之下Frank的油腔滑調形象。與之相比，祝（2007）則將其直譯為“別說我怒氣沖沖。我是累了。熱得受不了。”從“施為用意”在譯文中的處理來看，似乎並沒有予以恰當的語用緩和處理，因此就目前Frank的身份語境來看，譯文略顯生硬一些。

在文學作品翻譯中，除了要考慮話語的“施為用意”傳遞之外，還要考慮到言語行為的序列性特徵在譯文中如何處理的問題。儘管經典言語行為理論均以單個言語行為作為分析單元，但現實語言運用中的言語行為並非單個出現，而是體現為一個言語行為序列。Searle（1992）對於傳統言語行為分析“孤立性”的批評直言不諱，其他一些學者（Edmonson，1981；Clark，1991）同樣對言語行為理論的這一局限性有所察覺，並嘗試改進。其中最為典型的是Ferrara（1980）所提出的“言語行為序列（sequence of speech act）”假設。一般來講，言語行為序列當中會存在一個核心言語行為（head act），用於傳達該言語序列的主要施為用意；同時還會在核心言語行為的前後（或同時）出現附加言語行為（additional act），為主要施為用意提供理據性支撐。就當前內地語用翻譯研究而言，言語行為理論的應用研究大多囿於單個言語行為的考察，對於言語行為的序列性特徵關注不夠，而注意利用言語行為的這一特點來解決翻譯中諸多矛盾的研究個案更為少見。下面結合一個具體實例就這一點嘗試探討：

例二：

原文闡釋：Frank因為想和Emma套近乎，所以他首先打開了話匣子。Frank這時所說的一段話中，核心言語行為可以被判定為致謝話語（How much I am obliged to you），而其他的話語都是對自己向Emma致謝的具體原因陳述（for telling me to come today! If it had not been for you, I should certainly have lost all the happiness of this party. I had quite determined to go away again），因此這些後續話語表徵的都是附加言語行為。這樣看來，Frank選擇了致謝話語（How much I am obliged to you）佔先的交際策略來和Emma搭訕。從交際效果的角度講，Frank的這一策略是成功的，因為Emma的確如他所願開始與他攀談，儘管Emma對Frank的批評還是若隱若現。Frank成功展開會話交際深層原因在於社會交往過程中，致謝是拉近彼此距離十分有效的一個手段——感謝以犧牲說話人的面子為代價來提升對方的面子，這是一種比較常見的語用移情策略。在當前語境下，可以說Frank選擇致謝話語佔先比其他話語選擇要更為適切一些。相應地，為了有效地在譯文中再現Frank較高的社會交往能力，Frank的開場白所涉及的言語行為序列之間的關係在譯文中需要採取語用處理。

譯文評析：在兩個中譯本中，李（2008）保留了原文感謝語佔先的特點，他們先是翻譯“我真是太感謝你了”，之後再給出具體感謝的原因“多虧你叫我今天一定來！……”。相對而言，祝（2007）的譯本首先給出的具體原因“你叫我今天來”，而後給出的是具體的感謝“我多感謝你啊！”不難發現，二者對於感謝這一言語行為序列的呈現順序存在差異。如果單從資訊焦點孰先孰後的標準來看，似乎兩種譯文均還說得過去。但是，就當前語境與Frank言語行為序列中各個言語行為之間的邏輯主次關聯性來看，致謝行為作為核心言語行為被前置更為合理的。否則，Frank打開話題的

行為就顯得十分生硬，並與後續話語在語用連貫性（pragmatic fluency）上存在衝突。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失信原文”的批評，同時還滿足了當下話語交際的適切性要求，可謂一舉兩得。一直以來，在譯文中資訊焦點到底應該如何調配始終是譯者不可回避但卻解釋乏力的一個難題。上例分析表明，再次遭遇這種糾結的“二難困境”之時，語用視角介入可能會為譯者指出一條明路。

（二）會話含意的理性提取

Grice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為了保證交流的順利進行人們需要遵守“合作原則”。參照康德（Kant）的分析框架，Grice（1967）將這一原則細化為四個準則，分別包括：

1. 量的準則（quantity maxim）：所說的話應包含交談目的所需要的資訊，所說的話不應包含超出需要的資訊；
2. 質的準則（quality maxim）：努力使你說的話是真實的，不要說自知是虛假的話，不要說缺乏足夠證據的話；
3. 關聯準則（relevant maxim）：說話必須與談話內容有關；
4. 方式準則（manner maxim）：講話要清楚、有條理，具體表現為避免晦澀、避免歧義、簡煉、井井有條。

但是在交際過程中，人們往往有意違背這些準則。Grice（1967）認為，一旦人們偏離這些準則，交際的另一方就會設法去領會說話人所傳遞的深層意義，這種意義稱為“會話含意”（implicature）。誠如前文所說，小說《愛瑪》的語言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作者在行文中巧妙地埋下豐富的會話含意。為了生動有效地再現小說原文的語言技巧與魅力，這就要求譯者結合上下文語境，準確地傳遞小說人物對話或者作者敘述性話語中所隱含的弦外之音。換言之，小說中通過違反合作原則的相應次則而催生的任何會話含意必須完美地在譯文中得以再現。從語用視角介入文學翻譯評價，首當其衝的就是考慮譯文對於小說原文對話中會話含意的具體處理情況。例如：

例三：

原文闡釋：經過一番辯駁之後，Frank改變具體交際策略，將話題的焦點轉移到其他同遊的身上。於是，他以Emma為幌子說道“ladies and gentleman, Miss Woodhouse... desires to know what you are all thinking of?”。話音剛落，有些人下了，並回以幽默的回答；但是有些人（Knightley和Elton夫人）並不是很買賬。作為Emma的暗戀者，Knightley對於Frank與Emma之間公然調情十分不悅。從Knightley的話語同合作原則及其次則的關係來看，他違背了合作原則的相關準則——與其應邀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Knightley選擇詢問“Emma是否真的想知道大家在想什麼”（Is Miss Woodhouse sure that she would like to hear what we are all thinking of?）。結合上下文語境，可以此時Knightley所表達的並非字面意義，而是通過違背相關準則生成會話含意，並且這一含意可能對於相關人物並不是很友好（Knightley的真正意圖是說，其實每個人都認為Emma和Frank你們倆的行為不是很得體）。Knightley之所以選擇間接地傳遞自己的含意，是因

為這樣可以一舉兩得：既能表現出自己的紳士與禮貌風度，同時又可以間接地表達自己對於Emma有失淑女風範的批評。這樣來看，Nightley的話語選擇可以被定性為一種隱性話語策略，它可以幫助說話人不留痕跡地傳遞不禮貌的含意，從而避免公開的面子威脅行為所帶來的不快（Brown、Levinson，1987：211ff）。因此，Nightley並不是直接明示而是暗示Frank和Emma行為有失得體。也正因為如此，Emma沒有辦法反詰，同時可以假裝糊塗並一笑置之。

譯文評析：兩組中譯本的作者選擇了幾乎相同的方式來保證Nightley話語的語用意義與原文保持一致。一方面，把“what”直接翻譯為“什麼”，而不是將其予以縮限處理，這就避免了聽眾及讀者對於Nightley的真實意圖以具體化充實。另一方面，兩組中譯本的作者保留了Nightley呼語指向的模糊性。依據當下語境可知，Nightley的話是針對Frank的提議而言的，但其話語同時也是說給Emma聽的。兩組譯者均沒有將呼語“Miss Woodhouse”單獨拿出來翻譯（例如：“伍德豪斯小姐，真的很想聽聽我們大家都在想什麼嗎？”或者“伍德豪斯小姐，是不是肯定想聽聽我們大家都在想什麼嗎？”），而是選擇將其作為句子的主語譯出（“伍德豪斯小姐真的很想聽聽我們大家都在想什麼嗎？”或者“伍德豪斯小姐是不是肯定想聽聽我們大家都在想什麼嗎？”）。這樣，在與原文保持一致的同時，也完美地再現了Nightley話語指向一石二鳥的效果。下面再看一個例子：

例四：

原文闡釋：在Nightley不太客氣的評價之後，Emma表示不想聽大家的意見，Elton夫人反應如下：

‘It is a sort of thing’, cried Mrs. Elton *emphatically*, ‘which I should not have thought myself privileged to inquire into. Though, perhaps, as the Chaperon of the party- I never was in any circle- exploring parties- young ladies- married women-’ (Austen, 2008: 334)

正如同Nightley一樣，Elton夫人同樣採取了隱性話語策略以便表明自己對於Emma和Frank公然調情行為持否定態度。從話語的合作性來看，Elton夫人違反了相關準則，因為她的話語與Frank的提議無關，亦與Nightley的提問沒有任何聯繫。Elton夫人對於相關準則的違背加上她話語中所使用的“對比性強調”（contrastive stress）（注意詞彙“emphatically”和“I”的斜體化處理）話語策略表達了一種諷刺意味（Brown、Levinson，1987：217）。依據當下語境，可以確定Elton夫人的批評應該是指向Emma的不當舉止。

譯文評析：兩組漢譯本的作者對於Elton夫人間接地批評Emma採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就Elton夫人違反相關準則的話語翻譯而言，兩組譯者不約而同地採取了直譯的策略，幾無差別。但是，二者在“對比性強調”再現方式上卻大相逕庭，各不相同。雖然兩個譯本均沒有採取英語所慣用的斜體強調法，但兩組譯者均通過改變字體的方式突顯了Elton夫人原文話語的“對比性強調”這一特點。具體來說，李（2008）使

用的是楷體，而祝（2007）則選擇了仿宋體，據此以示和其他話語在字體（宋體）上的區分。此外，李（2008）還採取了添加成分的方式來突顯Elton夫人話語的“對比性強調”特徵：李（2008）一方面在“連我都自問沒有這份榮幸，都還無權去探究呢（which I should not have thought myself privileged to inquire into）”中，添加了一個程度副詞“連”——以自己為底限從而突顯當下事件；另一方面在“我這個人可是從來不搞什麼小圈子的（I never was in any circle）”中通過補充出“這個人”來復現Elton夫人自己的身份，進而達到強調對比鮮明的目的。相對而言，祝（2007）的譯文中則沒有出現上述附加性強調特徵，未表現出任何變異性處理的痕跡。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的會話含意生成往往不僅僅隱藏於小說人物的會話當中，還可以體現在敘述者的話語當中，而這一點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換言之，小說敘述者話語中的含意挖掘同樣具有重要性，如何在譯文中再現同樣值得關注。下面看一個這樣的例子：

例五：

原文闡釋：對於Frank的提議“Ladies and gentleman, Miss Woodhouse... desires to know what you are all thinking of?”，並不是很買賬的人除了Nightley之外，還有Elton夫人。小說中的敘述者交待，在聽Frank說“Miss Woodhouse, who, wherever she goes, preside”之後，Elton夫人對此“swelled”（Mrs. Elton swelled at the idea of Miss Woodhouse's presiding）。但是，具體因何而“swelled”，小說並未作任何說明。合作原則的數量準則要求說話人應該提供足夠的話語資訊，但小說敘述者並沒有滿足這一要求，因此違反了數量準則。據此，本文有理由相信這一話語暗含一定“弦外之音”。確切地說，從語義內容來看，“swelled”的具體內容指代不明，只能由讀者自行完成補足語填充。這就啟動了一種Bach（1994）所說的“隱意”（implicature）——這些內容作為明示話語的副產品而在讀者或聽者的認知系統中隨境化生。簡言之，對於Elton夫人“swelled”的內容只能由讀者自行揣摩生成。依據常識和語境，可以想像得到Elton夫人此時內心的氣憤與憤懣。那麼兩個中譯本中對此又是如何處理的呢？

譯文評析：李（2008）採取了補全“swelled”具體內容缺失成分的翻譯策略，從而將“swelled”所觸發的話語暗含取消。換言之，他們選擇以較為顯化的方式（“氣得肚子都鼓了起來”）交待此時Elton夫人的狀態。這樣處理滿足了合作原則的數量準則要求，同時使得敘述者的話語更為變得較為直白，也在某種程度上縮限了讀者闡釋的具體伸展空間。與之相比，祝（2007）更傾向於取“swelled”的字面意思，將其譯為“激動起來”，並未對“swelled”的具體內容予以填充，因此原文的話語暗含得以保留，相應地讀者被賦予充分的自主想像與填充自由。

（三）面子策略的靈活維繫

人們在言語交際方面擁有眾多的策略手段，其中給一個主要手段就是禮貌。具體來說，人們在交際活動中希望彼此維護對方的面子，並隨着面子威脅程度的增大而採取較高度度的禮貌策略。具體來說，面子威脅程度取決於交際雙方之間的社會距離、

社會權勢差別。針對面子威脅程度，Brown、Levinson（1987）將禮貌策略分為積極禮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和消極禮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積極禮貌策略是為了避免或者減少交際者的正面面子的損失，帶有明顯的“移情”特點——以接近對方為目的，其中心在於提升彼此相互認同。消極禮貌策略則是為了維護負面面子而採取的策略，帶有明顯的回避特徵，其重點在於避免行動或者自主決定的自由受到干涉。這一思想同樣在Leech（1983）的禮貌原則中有所體現，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下面結合具體例子說明面子策略抑或禮貌原則如何被應用於小說《愛瑪》的中譯文處理與評價當中。

例六：

原文闡釋：在Elton夫人和Nightley對於Frank的提問予以間接品評之後，Frank意識到自己的話可能使得在場的一些人有所不快，於是選擇公然撒謊 “She (Miss Woodhouse) demands of you either one thing very clever... or two things moderately clever... or three things very dull indeed” 而改變話題。這時Bates小姐就第三個要求 “three things very dull indeed” 說到：

That will just do for me, you know. I shall be sure to say three dull things as soon as ever I open my mouth, shan't I? – (looking round with the most good humored dependence on every body's assent) – Do not you all think I shall? (Austen, 2008: 335)

按照Leech（1983）提出的禮貌原則來看，Bates小姐的上述話語符合禮貌原則中的“謙遜準則（Modesty Maxim）”，因為她很明顯在“儘量貶低自己，或者讚美別人”。確切地說，為了貶低自己，Bates小姐甚至還是用了附加疑問語“shan't I?”來徵求在場每一個人的意見與認可。附加疑問語正是Brown、Levinson（1987）中所提到的積極禮貌策略的一種，它可以幫助說話人儘量和聽話人建構認同感與歸屬感。具體來說，Bates小姐通過使用附加疑問句就是要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我和你們一樣都屬於同一類人，我們擁有共同的需求、價值觀以及目的”。因此，附加疑問句就是Bates小姐話語的焦點之一，它與最後的一個簡單問句“Do not you all think I shall?”從而建構自己在眾人當中的“愚者形象”，從而達到“貶己讚他”的目的。十分有趣的是，原文中還存在一個具有語用離情用法的“you”的複現連環：“That will just do for me, you know.”、“I shall be sure to say three dull things as soon as ever I open my mouth, shan't I?”和“Do not you all think I shall?”。此時，Bates小姐在“貶己讚他”，因此“you”的語用離情用法使得她的禮貌用意對比的更為明顯。可以說，“you”的複現連環對於塑造Bates小姐幽默而又固執的性格異常搶眼。

譯文評析：對於Bates小姐所採取的積極禮貌策略，兩組中譯本的作者都採取了類似的翻譯手法：李（2008）將其譯為“你們說是吧？”；祝（2007）將其譯為“是不是？”。他們的譯文處理是合理的，因為在漢語當中要想得到對方的認同，說話人同樣可以在句末加上附加疑問語，如“是不是？”或“好不好？”等。但是，對

於“you”的複現連環兩組譯文採取了不同翻譯策略。李（2008）將這一段譯為“你們看，這一條跟我正對茬兒。什麼時候只要我一開口，管保淡而無味的段子三個就有了，你們說是吧？”、“你們大家說是不是啊？”通過翻譯出入三個“你們”，李（2008）成功地再現了原文“you”的複現連環，使得相同的元素可以像似地表徵Bates小姐的固執與幽默。比較而言，祝（2007）則未能很好地再現Bates小姐幽默而又固執的一面，他們將這一段譯為“我這麼辦就行了，你知道。我一開口就會說三段笨拙的話，是不是？”、“你們不都認為我會這麼說嗎？”比較而言，李（2008）似乎更好一些。下面再來看一個有關消極禮貌策略評析的實例：

例七：

原文闡釋：由於Elton夫婦不想再和Emma等人在一起無聊下去，於是兩人一起離群獨遊。二人走了以後，Frank對於Elton夫妻二人夫唱婦隨進行了諷刺——“二人真是彼此般配”（how well they suit one another），並且屬於“閃婚一族”。其實，Frank實際上也在暗示自己與Jane Fairfax之間私定終身一事，為了避免直接談及自己的“悔意”而傷害到Jane的感受。這樣他就把一個具有面子威脅性的話語轉變為一個一般意義上的評價（how many a man has committed himself on a short acquaintance, and rued it all the rest of his life）。通過泛化具體批評對象，Frank達到了消極禮貌策略要求的“盡量回避”目的。可以說，此時Frank的這句話調用了Brown、Levinson（1987）所謂的消極禮貌策略，這裡被用來間接地表達具有冒犯性的會話含意。

譯文評析：對於Frank的暗示話語，兩組中譯本的作者都採取了基本相同的翻譯策略，但是略有差別。從譯文與原文在字面意思上的忠實度來看，李（2008）做得要好一些，他們將其譯為“……你對一個人的人品性格，能有多少真正的瞭解？壓根兒等於零！——你一絲半點也別想瞭解到。要瞭解一個女人，只有見到了在她自己家裡的她，跟她在一起的同道在一起的她，完全是平日面目的她，你才能得出一個正確的判斷。”但是，此時Frank出於禮貌的要求他需要盡可能地泛化自己話語的指稱對象。儘管“you”在英語中可以充當泛指代詞，但是其對應的中文“你”則不然，因為在當下語境將“you”譯為“你”則明顯地賦予了這個詞彙語用移情的特點——拉大了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的具體並鮮明地予以突顯。顯然，這不是在泛化Frank話語指向而是在聚焦突顯。從接受心理角度來講，這樣對於“你”的重複提及會對Jane造成一定的刺激與傷害，在本質上違背了消極禮貌策略所要求的“迴避”規則。比較而言，祝（2007）較合理地採取了隱去“you”的漢語對應譯文“你（們）”的譯法，將其譯為“……至於要說在巴思或者任何公共場合對人的品性有真正的瞭解——那是空談；不可能有什麼瞭解。只有看到女人們像平時那樣在她們自己家裡，在她們自己人中間，你才能夠做出任何正確判斷。”這樣就可以避免話語指示範疇“過細”而直接給聽話人帶來的不快。就這一點來看，祝（2007）對於譯文的處理要優於李（2008）一些。

四、結語

從語用視角評價文學作品的翻譯，是一個完整而又特殊的批判性再現過程。此間，評價者要想確定譯文是否已把原文語用意義再現於譯文當中，就必須立足於讀者的語用視點，力求窮盡語言及語言使用所涉及的相關維度，積極再現原文的語用內涵。從語用視角切入文學作品翻譯評估，並採取相應的策略，不但對於小說的文學批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考慮小說譯入外語後品質高低的重要參考指標。可以說，從語用視角出發考慮翻譯問題，可以更準確地把握住原文的核心與精髓，從而避免譯文中出現偏誤。這對於譯員培訓，以及一線翻譯教學都具有同樣重要的參考意義。出於篇幅及精力所限，本文只是以小說《愛瑪》中部分話語的漢語譯文為語料，嘗試說明了文學作品翻譯評價過程中語用視角如何得以介入，具體表現為言語行為、會話漢語及面子策略三個維度。當然，本研究同時存在諸多不足。例如：樣本語料容量不是很充分；詞彙、語體、歸化或者異化策略等諸多維度非單一語用維度所能窮盡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待於後續研究繼續探討，而本文的初衷就在於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這一新興議題的重視。

註釋：

1. 選擇言語行為、會話含義和禮貌策略等三個分析維度是基於如下幾個原因：第一，三者可以被看作當代語用學研究範式當中最為成熟的研究模組，因此其理論基礎也相應地顯得更為穩妥夯實，這對於保證原文闡釋的正確性尤為重要；第二，三者作為較為明晰的分析單元，具有明確的分析路向，這對於譯文分析所涉及的漢、英比對尤為重要，否則容易導致分析混亂、遊戲規則不統一的偏見性分析，而這恰好是翻譯比較研究所應竭力避免的。
2. 依據Leech (1983) 的界定，語用用意 (pragmatic force) 一般收到兩股力量的制約：施為目標和社會目標——二者分別對應於話語的施為用意和修辭用意——即它所傳遞地意義需要考慮說話人對於修辭原則的遵守 (如說話人有多實在、禮貌或諷刺)。可見，二者一起構成了話語的語用力量。據此，在文學作品翻譯的語用考察當中，就不但要注意施為用意的考察，還要注意修辭用意的考察。前者表現為言語行為的性質，而後者則直接體現為禮貌策略的靈活調配。

參考文獻：

- (1) 左自鳴，〈清新流暢達意傳神——評張經浩先生的譯作《愛瑪》〉，《中國翻譯》，1995(2)，第38-40頁。
- (2) 張新紅、何自然，〈語用翻譯：語用學理論在翻譯中的應用〉，《現代外語》，2001(3)，第285-293頁。
- (3) 葉苗，〈關於“語用翻譯學”的思考〉，《中國翻譯》，1998(5)，第10-13頁。
- (4) 簡·奧斯丁著，祝慶英、祝文光譯，《愛瑪》，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 (5) 簡·奧斯丁著，李文俊、蔡慧譯，《愛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 (6) Austen, J. (2008). *Emma*. London: Penguin Group.
- (7)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Bach, K. (1994).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Mind*, 9, 125-162.

- (9) Brown, P., & Levinson, S.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Clark, H. (1991). Responding to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S. Davis (Ed.), *Pragmatics: A reader* (pp.199-2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1) Edmonson, W. (1981). *Spoken discourse: A model for analysis*.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
- (12) Ferrara, A. (1981). An extended theory of speech ac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 233-252.
- (13) Grice, H. P. (1967).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H. P. Grice (1991),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pp. 22-57). Cambridge, MA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4) Gutt, E. A. (1991).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Oxford &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15) Hickey, L.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6)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17) Leech, G. N., & Short, M. H. (1981).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18) Levinson, S.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 Morini, M. (2007). Say what you mean, mean what you say: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Italian translations of Emm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6 (1), 5-19.
- (20) Searle, J. et al. (1992). (On) *Searle on conversation*.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he Intrusion of Pragmatic Perspective into the Evalu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Emma*

Mao Yansheng

Abstract:

How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proper evalu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has long been a crucial but troublesome issu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is article, it is tentatively argued that the intrusion of pragmatic perspective will help to crack this conundrum, with foci on Speech Act Theory,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and Politeness Principle. In other words, in evaluat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du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possibility and practicality, which can serve as one major parameter for adopting prope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an effective way to avoid irrational evalu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pragma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evaluation, pragmatic perspective, intrusion, *Emma*